

# 改善投资结构 实现消费升级

我国投资与消费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高投资、低消费的占比问题,而是投资与消费在结构、效率和质量上的问题。这与我国的发展阶段以及较高的经济增速紧密相关,同时消费占比也存在一定数据低估因素。因此,不宜简单地从投资和消费的总量和占比上下结论,简单地限制投资、刺激消费。事实上,高质量、高效率、创新性投资不嫌多;而低端消费、不可持续的透支消费也不嫌少。应该从结构、效率和质量三个维度全面分析我国投资与消费存在的问题,并以此为基础制定相应的政策。

□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 黄剑辉

## 以要素投入为主的粗放式投资模式

经济发展过于依赖以要素投入为主的粗放式投资模式。当前我国处在以要素驱动为主要动力的建设阶段,并正向效率驱动为主要动力的产业阶段发展,但目前投资仍主要以要素投入的粗放式发展方式为主。

一是资源要素的高投入。从我国的投资结构来看,2012年制造业投资占总投资的34%左右。其中,与基础资源密切相关的行业(包括石油化工、金属、非金属的冶炼与制造)占到制造业的30%左右,相当于占到整体投资的10.5%左右,再加上采矿业,我国固定资产投资有14%左右投向了直接消耗基础资源的行业。此外,房地产、电力燃气生产供应等高资源依赖型行业的比重也相当高。

二是土地要素的高投入。作为对土地资源具有较高依赖性的房地产行业,2012年的投资占我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的比重超过25%。

三是能源要素的高投入。2012年六大高耗能行业投资占到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体的15.1%。投资对能源要素高投入的依赖导致单位GDP能耗居高不下。2011年每万元GDP能耗为0.69吨标准煤,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约为0.31吨标准煤/万元,此数据经过标准油向标准煤换算)以货币换算)一倍多。

环境污染的巨大外部成本未体现在投资决策中。成本是衡量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但由于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及管理并不健全,环境污染的外部性成本普遍未体现在投资决策中,粗放式的投资扩张给环境造成了相当严重的破坏,产生GDP的质量也相对较低。2011年单位GDP平均产生固体垃圾70克/元,废气1.43立方米/元,废水1.39立方米/元,均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民间投资仍有较大发展空间。近年来民间投资不断发展,2012年末民间投资占社会总投资的比重达60.4%,较十年前约30%的比重有了较大提高,但与发达国家(2012年美国为81.4%)的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目前民间投资的发展仍受到行业准入限制,据统计,全社会80个行业中,允许外资进入的有62个,允许民间资本进入的只有41个,而民间投资在传统垄断行业所占比例也非常低。此外,民间投资还面临着融资渠道不畅通,项目审批障碍较多等问题。

创新性投资明显不足。现有投资结构中,与粗放式投资占比较高对应的是创新性投资的明显不足。目前科研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仅为1.4%,明显落后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瑞典为3.4%,日本为3.3%,美国为2.7%)。创新性投资不是简单地通过要素投入增加未来产出,而是通过创新提高生产效率,在增加产出的同时也能创造新的消费需求和市场,是经济实现跨越式、赶超式发展的重要动力。目前,全球正处于新技术革命的浪潮下,在国外3D打印、页岩气、云计算等一系列重大技术不断实现突破的背景下,我国创新性投资明显不足可能导致再一次落后于新技术革命的浪潮。

与投资匹配的金融制度不合理。一是间接金融为主的融资体系,使得大型企业国有企业更易获得银行的信贷支持,中小企业难以获得相应融资,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民间投资的发展。二是利率尚未市场化,导致资金要素价格扭曲。三是资本市场功能尚待完善,中小企业、尤其是创新性企业的融资渠道受阻,导致创新性投资占比较低。

## 收入分配不合理抑制消费增长

收入分配不合理与社保制度不健全抑制消费增长。一是在国民经济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不断下降。从1992年54.6%下降到2009年的49.0%,不

仅落后欧美等发达国家5-6个百分点,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二是城乡、行业、群体之间收入分配不公与差距过大,2012年基尼系数为0.47,已连续十多年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三是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导致居民对消费存在后顾之忧,消费者信心不足。提高居民收入,促进收入分配公平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是促进我国居民消费合理增长的最根本手段。

产出与消费结构存在内外错配。我国作为“世界工厂”,现存产能很大一部分用于出口而非国内消费。在不改变产出结构的情况下,即使将国内的刺激消费手段发挥到极致,也无法满足国内的供需平衡。因此现在一味地依靠各类刺激手段鼓励国内消费不仅收效甚微,还可能引发提前消费,甚至过度消费、透支消费。

产品与服务的质量问题影响国内消费。近年来,中国居民所表现出的境外高消费需求,与国内消费需求不足形成强烈反差。一方面国内消费需求低迷,一方面国民却在为全球消费需求大作贡献。究其原因,与我国国内产品与服务的质量较差有密切关系。比如近年来屡见不鲜的奶品安全问题,导致大量“中国妈妈”海淘洋奶粉;再如国内旅游景点乱收费与劣质服务,导致大量国内游客选择性性价比更高的境外旅游景点等。这表明我国居民并不是没有消费能力,而是不敢也不愿在国内消费。

短期刺激消费政策导致提前消费。为应对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我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刺激政策。其中,在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层面推出了一系列“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优惠政策,采用购置税减免及财政补贴等手段促进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短期刺激内需的作用。但从长远来看,这种“治标不治本”的短视政策,却导致居民对耐用消费品的提前消费,甚至透支消费。由于耐用消费品的使用周

期很长,在政策退出后,后续需求明显不足,这也是导致近年来我国消费需求不断下降的另一个原因。

近年来鼓励透支消费的做法可能造成长期严重危害。近年来,不少学者提出消费观念落后是导致我国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甚至提出“艰苦奋斗”、“勤俭节约”、“量入为出”的传统观念在我国由短缺经济进入产能过剩阶段后已经不再适用,取而代之的是“提前消费”、“超前消费”的观念。在不少年轻人中还出现了“月光族”,“月光族”的现象。同时社会上公款吃喝、大肆浪费的现象也屡见不鲜。这种观念和做法不仅不可取,还可能造成严重的危害。过度透支消费与我国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符;发达国家的过度消费导致家庭部门负债过高,引发债务危机和经济衰退;过度消费也解决不了我国消费不足的根本问题。

## 不宜简单从总量和占比下结论

我国高投资、低消费的现状与发展阶段以及较高的经济增速紧密相关,同时消费占比也存在一定数据低估因素。因此,不宜简单地从投资和消费的总量及占比上下结论,简单地限制投资、刺激消费。事实上,高质量、高效率、创新性投资不嫌多;而低端消费、不可持续的透支消费也不嫌少。应该从结构、效率和质量三个维度全面分析我国投资与消费存在的问题,并以此为基础制定相应的政策。

依靠改革红利改善投资结构,由要素驱动转向效率和创新驱动。我国经济的发展阶段正在由要素驱动的建设阶段向效率驱动的产业阶段过渡。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由总量增长转变为经济结构和产业的升级以及生产效率的提高,经济发展的动力由要素红利变为改革红利、制度红利。对此,要进一步深化改革,降低要素(资源、土地、能源)依赖产业的投资比重,积极鼓励高质量、高

效率、创新性的投资。

在投资结构升级中允许存在合理程度的产能过剩。不少人认为产能过剩是我国应限制投资规模的一大原因,但要实现投资升级,需要允许存在一定的合理产能过剩。一是产能过剩是结构调整的动力,没有产能过剩,就无法通过市场实现高端产能淘汰低端产能。二是产能过剩保持市场始终处于供略大于求的状态,使生产者处于激烈竞争,有利于技术的进步。三是产能过剩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消费者的利益,也控制了通胀的水平。因此,不能因产能过剩就限制高端产能、高效率产能的扩张,而要允许这些产能通过整体的产能过剩来淘汰低端产能。

积极鼓励高质量、高效率、创新性投资。一是积极鼓励民间投资的发展,逐步开放当前垄断行业的进入门槛,鼓励市场化的高效率民间投资进入垄断领域;二是大力鼓励创新性投资,加大新兴产业与高科技产业的投资力度;三是加大投资对环境损害的评价和监管力度,要显著增加投资对于环境损害的外部成本,影响投资决策,促进投资质量的提高。

金融制度的发展要匹配投资升级。一是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发展创投、风投、创业板等融资途径,为创新性投资开辟融资渠道;二是发展各级债券市场,大型国有企业可发行成本更低的长期债券,将信贷资源和股票市场让位于民间企业、中小企业,后者也可通过公司债、中期票据、短融等手段进行融资;三是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减少金融要素价格的扭曲,使利差收益与风险对等,从而加大银行对中小企业、民间企业的放贷动力,并减少民间融资、影子银行的规模。

## 改善消费结构、效率和质量

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与社会保障制度,促进社会公平,从根本上改善制约我国居民消费的因素。一是推进收

入分配改革,调整初次分配利益关系,通过税收补贴等措施实施合理的二次分配,减少贫富差距,增加整体居民的边际消费需求。二是增加财政对社会保障投入,扩大社会保障范围,提高社会保障福利水平,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广覆盖、保基本、分层次、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三是解决城镇化过程中“村民变市民”的政策障碍,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保障农民工及子女的权益,促进城市低收入群体消费的提升。

实现我国消费结构的升级。一是降低食品消费在整体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主要依靠增加居民收入,保持农产品价格稳定来保障。二是提升服务业的消费比重,增加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收入。三是提升文化教育消费消费的比重,改善居民文化生活,促进我国的文化繁荣。四是提升我国消费品和服务的质量,重视食品安全和知识产权保护,将我国居民的消费层次由低质量食品用品、山寨产品、低端产品升级到高质量的放心产品,由国外高端消费转变为国内高端消费。

反对过度消费、透支消费、奢靡消费,鼓励合理消费、理性消费。欧美过度消费引发的危机表明了“勤俭节约”、“量入为出”的精神并不过时,要反对过度消费、透支消费、奢靡消费,公款吃喝和铺张浪费并不是促进消费,“月光”、“月光”更是不可持续的消费。合理消费和理性消费可能在个体上反映了消费的减少,但整体来看,反而能够促进社会资源的更合理配置,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效用提高,对整体经济是有利的。

(黄剑辉,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成员,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所在单位无关。王阁,应习文对本文亦有贡献)

# 提高国内需求占比 避免过度依靠外部循环

□国家信息中心 徐策

## 从支出法GDP核算角度的两种衡量内需方法

支出法GDP核算为衡量内需提供了基本框架,具体方法有两种。一是以投资率加上消费率作为内需占GDP的比重;二是在投资率加上消费率的基础上减去进口占GDP的比重。两者在统计上的区别是,前者在考察内需的口径比较宽,包括了国内居民对外部的需求,而後者的口径相对比较窄,只反映了国内居民由国内满足的消费和投资需求,不通过进口来满足的需求。

两种内需衡量的内需占比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1970年,二者相差为2.7个百分点,到2005年达到最高值31.6个百分点,此后略有回落,但仍然保持在20-30个百分点。这表明以进口方式来满足国内需求的比重在大幅增加。从形态看,两种方法衡量的结果运动轨迹的方向大体一致,二者统一在经济周期性波动上。但需要解释的是,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以及2011年,均是由于进口大幅增加,也出现了二者反向运动的现象。因而,是否将进口排除在内需之外成为衡量内需的关键。

如果将进口作为内需,该比重越来越大意味着我国参与全球经济关系的程度不断加深,依靠国际市场满足内需的程度也不断提高。然而,这部分需求对于本国的生产和投资难以形成直接的互动关系。只有依靠本国投资、生产满足的需求才是有利于建立投资与消费良性互动关系的部分。此外,从恒等式的另一端看,这部分内需还可以用GDP扣除出口来衡量。随着出口规模和占比不断上升,也就意味着经济增长越来越依靠出口,内需力量相对减弱。如果以第一种方法衡量内需,从数据上看,我国似乎从未出现内需不足的问题,这就与近十年内外失衡格局的现实不符。因此,从这个

近年来,尤其是经历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界对内需的重要性已经形成共识。目前,扩大内需已成为我国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以扩大内需为重点的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然而,在对于什么是内需、如何衡量内需、度量内外需失衡的问题上仍然没有形成共识。这就会影响对结构失衡的判断,进而影响扩大内需的着力点、政策措施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 两种方法衡量内需的国际比较

运用世界银行数据库的时间序列数据,根据上述两种方法分别计算出主要国家的内需占比,可以得到一些规律性的结论。

(一)各国的总体水平与趋势。以第一种方法衡量的内需普遍较高,平均在100%左右,并且除处于危机若干年份外的其他时期保持相对平稳态势。以第二种方法衡量的内需不同国家出现了分化,美国、日本、巴西三国总体保持平稳,而中国、德国、韩国、印度则均呈现总体下滑态势,危机期间有所回升,2010年后再度下滑。

(二)我国与其他国家主要差距。从2011年横向比较的数据看,按照第一种方法,我国与其他国家内需差距并不大,差距最大的有印度和美国两个国家(低于印度9.6个百分点,低于美国7.9个百分点)。按照第二种方法,我国内需比例低于巴西19.5个百分点,低于美国17.5个百分点,低于日本16.2个百分点,但高于德国18.8个百分点,高于韩国24.8个百分点,高于印度13.9个百分点。

## 几点启示与建议

(一)衡量内需是制定扩大内需政策的起点。扩大内需战略既是我国应对短期需求不足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更是我国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这一判断是基于对我国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及其可能带来的风险的深刻把握。然而,在

具体落实推动扩大内需战略、制定扩大内需政策时,首先要明确的是我国内需的现状和长期以来的内外需格局。否则,将难以瞄准扩大内需所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也难以抓住扩大内需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因而,衡量内需是制定扩大内需政策的起点和基础,只有在内需有所不足的条件下,扩大内需政策才有意义和前提。通过此前的分析,我们发现,如果按照第一种方法衡量内需,我国甚至并不存在内需不足的问题。事实上,在支出法GDP框架下三大需求对GDP贡献率和拉动增长百分点数也都反映了内需始终是拉动经济增长绝大部分的力量。然而,这与我国外贸依存度持续攀升,贸易顺差持续扩大,我国参与全球化和国际大循环程度越来越深、内外经济失衡问题日益严重的事实有所不符。如果按照第二种方法衡量内需,以2011年为例,我国内需占比由第一种方法测算的95.9%降至68.6%,下降27.3个百分点,而且,几十年来,内需几乎持续保持下降态势,显然这更接近事实。

(二)过度依靠外部循环可能导致经济脆弱。从第二种方法恒等式来看,内需还可以用“GDP-出口”来衡量。内需不足更深刻的含义是,整个经济系统对外部经济的依赖过高。长期以来,我国通过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参与到了国际大循环之中,利用我国土地等自然资源、人力资源以及生态环境容量,从事由发达国家转移而来的加工制造,形成了庞大的产能。这些产能中的绝大部分又返销回发达国家之中。在

此过程中,我国留下了一些税收,获得了微薄的利润、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成为非农就业。为此,从国家到地方层面,政府又在政策上为这种生产方式扫清障碍,并提供了各种优惠条件招商引资,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其主要的服务对象实际上是外需。从国土空间看,这些从事出口加工制造的国土似乎已成为发达国家的“飞地”,招商引资的分散化同时导致了“飞地”分散化布局。发达国家享受着在其授意和指导下制作而成的工业品的同时,并不必为此付出各种资源、环境以及市场风险等实质性却隐形的代价。这种对于过度依靠外需推动形成的经济增长背后,事实上形成的了被外需牵制的格局和扭曲的经济结构。其风险在于,一旦外需萎缩,势必对经济体造成大规模的影响,首先影响进出口,然后进一步影响投资需求,紧接着消费受到影响,使得经济增长自我恢复和调整的功能较弱,往往需要人为刺激,而这可能在短期内稳定经济,但在中长期内使问题进一步恶化和复杂化。政策含义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大国,经济的发展必须立足于内需增长,经济资源更多地服务本国需求,但需要指出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封闭。未来仍然要坚持扩大开发,提高开放的水平和层次,只是经济增长的出发点、落脚点要回到内需上来。

(三)出口导向战略必须要与全球价值链地位相结合。在第二种方法中,以2011年为例,我国与美国、日本等部分发达国家在内需占比上的差距比较

明显,分别低17.5个百分点和16.2个百分点;但同样作为制造业大国,并早已成为制造业强国的德国、韩国,其内需比率较我国还分别低18.8个百分点和24.8个百分点。上述格局维持了相当长时期,而非个别年份特殊情况。因而,事实表明,内需占比并不直接反映经济发达程度、发展阶段和健康状况。在内需相对低的国家中,德国和韩国在出口商品的价值链中占据了控制性的地位,出口创造的收入换取的是服务本国居民直接消费需求的商品,这种“大进大出”并不意味着经济严重失衡和不健康。反过来,在出口商品的价值链中处于低端被动的地位,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结构决定了我国的出口经常需要以进口为前提,因而大量进口并非为本国居民直接的消费,但也形成了“大进大出”的格局,但这种格局是影响经济健康的。也就是说,简单地说,内需不足是经济发展的问题并不科学,要具体看其对外需依赖的方式,在与外部经济发生关系时所处的地位。政策含义是,继续坚持扩大开发,在出口导向战略条件下,要通过自我品牌的建设,着力提高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出口的健康发展与扩大内需本质上并不矛盾。

(四)扩大内需应该与全球再平衡统筹协调。国际金融危机是对长期全球失衡的一次强制性调整,扩大内需战略在后危机时代被赋予了更重要的意义。扩大内需不能简单地提高消费和投资的规模、增速,而要深刻地认识到我国内需不足是全球经济失衡的结果,要积极适应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进程,在新的

国际经济格局中寻找自身定位。对于美欧等全球经济失衡中的“逆差方”而言,全球经济再平衡主要表现为:第一,进口下降,减少国内消费,提高储蓄率;第二,再工业化,使各种资源回归本土实体经济,尤其是探索新一轮周期增长点方面做出实质性的努力。对于中国等全球经济失衡中的“顺差方”而言,第一,扩大进口,稳定出口,提高消费,降低储蓄;第二,经历痛苦的“去产能”过程,一方面从总体产能规模上要缩减,另一方面,将瞄准外需的产能转型为瞄准内需的产能。进一步分析,扩大进口,稳定出口的结果,将使顺差缩小。按照第二种方法衡量的内需占比不一定提高,甚至还会进一步下降,但这却真正抓住了提出扩大内需战略背后的核心问题。因而,不能简单以内需占比的提高来判断扩大内需政策的效果。

(五)扩大内需的重点要强调投资消费互动。第二种方法所表达的内需含义指向的是由国内生产满足的国内需求。因此,真正做到国民经济发展立足于内需,提高内需占比,需要围绕这一部分需求制定鼓励和引导政策。如果说,用好“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是“国际大循环”,那么,构建投资与消费之间的良性循环机制则是“国内小循环”。长期以来,我国处于“大循环”高速运转,“小循环”低速不畅的格局。未来扩大内需的着力点正在于此。放松管制对于民间投资和中小企业根据本国和地方实际需求探索投资方向意义重大,这是构建投资消费互动的重要途径。此外,聚焦扩大内需的重点不应着眼于短期,而应该着力通过收入、社会保障、财政等体制改革系统改造供给面,引导供给面侧重服务本国需求。财政支出的效果相比减税、放松管制而言过于直接,且缺乏一个通过市场自我选择的过程。因而,下一步在政策制定上要减少使用财政直接支出的办法,更多地运用贴息、风险担保等经济杠杆,使财政政策与金融工具有机结合起来,在放大政策效果的同时兼顾市场的自由选择。